

# 灵魂的沦落与“道德上的发现”

——论康拉德的《诺斯托罗莫》

胡 强, 殷企平

(浙江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 康拉德是20世纪最杰出的英语小说家之一,但近年来,国内研究的重心大多集中于他的海洋小说和丛林小说,对他的社会政治小说却少有人论及。《诺斯托罗莫》被认为是康拉德最为出色的一部社会政治小说,该小说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和社会性主题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剖析这种关系,康拉德展示了他对人性与道德等众多社会伦理问题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 康拉德; 诺斯托罗莫; 灵魂; 道德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2-0098-07

康拉德是英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的小说按题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海洋小说、丛林小说和社会政治小说。近年来,康拉德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研究的重心大多在他的海洋小说和丛林小说上,对于他的社会政治小说却少有人论及。

《诺斯托罗莫》是康拉德最为出色的一部社会政治小说,甚至堪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比[1](p.81)。作者自言该书的写作占据了他“1903—1904年间的大部分时日”,“是紧随《台风》短篇集出版之后最令他感到殚精竭虑的一部长篇小说”[2](p.3)。小说写得很艰难,读起来也不容易。时序的变动,视点的频移,使读者有时不得不充分利用想像力,并通过一些“印象的碎片”对作品加以重构,以至于有论者提出,要读懂《诺斯托罗莫》最好还要带着“一种适合于读诗的批评分析方法”[3](p.8)。但这每一块的“碎片”对于小说的整体意义都同样重要,它使小说“形成了具有道德意味的一种布局”[4](p.318),同时也显示了康拉德作为一个现代作家所具有的现代意识和创新意识。

故事发生在柯斯塔瓜纳,一个作者虚构的“以压迫、无能、愚蠢、背信弃义以及野蛮、暴力而著称于世的国家”[2](p.82)。这个战祸连绵的南美小国不仅展现了过去一百多年拉丁美洲的政治历史,也为映照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标本。小说开始于港口城市萨拉科,它安宁而又平静,是“躲避商业世界诱惑的庇护所”[2](p.3);它把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为它拥有一座巨大的银矿,其矿脉之富,以致周期性的大掠夺都无法使掠夺者罢手。银矿是保佑萨拉科人“坚不可摧的神明”,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的崇拜偶像”。它不仅为当地带来了“彻底的变化”,同时也以一种“意义深远且难以捉摸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灵魂[2](p.81)。小说多股主线并行,如殖民主义、怀疑主义、英雄主义、个人信仰与历史宿命,等等。但较受评论者忽视的是小说的一个政治和社会性主题,即“道德理想主义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4](p.318)。

**[收稿日期]** 2003-04-23

**[作者简介]** 1. 胡强(1971-),男,湖南湘潭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小说研究; 2. 殷企平(1955-),男,浙江杭州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诺斯托罗莫是港口中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叛乱将至之际，他临危受命，将一船银锭运出港口，不料途遭不测，只得将银子藏之小岛后返回城里。他冒死送信解了困城之围，却发现自己被人利用，成了“嗷嗷叫唤的一条杂种狗”[2](p.344)。他于是改变主意，决定慢慢地富起来，直至最后成为财富的奴隶，于偷取银锭之际被人谋杀而死。诺斯托罗莫效忠的是铁路和港口中上层社会的所谓“体面人”。他身着镶有银纽扣的外套，常常沉浸在“某种精神价值”的欢乐之中[2](p.245)。他既不像叛军首领索蒂罗那样渴望拥有银子，也对奢华的生活没有兴趣。就在登船出发之前，他还把最后的一块大洋给了位在古城门洞里凄切呻吟的老人。他只在乎他的好名声和那“一片赏识的低语和谄媚的问候”，他生命的本质和真实性“都建构在人们崇敬目光的影像之中”[2](p.400)。

当诺斯托罗莫第一次离开藏银子的小岛游回陆地时，他似乎还忘不了他既体面又风光的过去，但同时也生平第一次感到了贫穷的拮据。一想到从此不能再在城里招摇过市，也不可能“在休闲的窝里备受尊宠”，他便感到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当“孤独、遭遗弃和失败的感觉”一齐压上他的心头时，他的精神面临着全面的崩溃[2](p.315)，意识到原来“任何人都把我当作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2](p.345)。他终于清醒了过来：出生入死地冒险护银，其实是无用的劳动，与事情最终的结局无关紧要。他的忠心被人利用了，他随时都可能成为“任何信仰、迷信或者欲望的牺牲品”[2](p.316)。同行的德考得已死，没人会知道银子的秘密，而财宝正在发挥它潜藏的威力，在他的脑海里搅起了波澜。他怨恨周围世界对他的无情无义，于是下定决心不让到手的东西丢失。虽然偷偷摸摸像贼一样地从岛上偷取银子也使他感到羞辱，但不义之财的幽灵此时“像个银造的人形，无情而秘密”地追随着他[2](p.413)，迫使他想“以毫无异议的手段攫取、拥抱、吞噬、驾驭这笔财富”[2](p.402)。他像故事开端出现的那几个贪财丧命的洋鬼子一样，“又富、又饥、又渴”，灵魂怎么也挣脱不出苦守着财宝的肉体[2](p.4)。当他以一种更为顽固的执迷抓住银子不放时，“他所有品质的纯真性都遭到了毁灭”[2](p.398)，即便是最令人神往的爱情。

诺斯托罗莫从心底里不信任姐姐琳达，不喜欢她那张“执著而激情洋溢的苍白面孔”。他与妹妹吉赛尔在“天性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相似之处”，爱情的选择这时只需要一个公开的表达就能够说清楚。但是银子闪亮的影像出现在他的眼前，“以无可忽视的沉默，强烈要求占有他的忠诚”。他害怕拒绝琳达后被禁止上岛，从而与银子永远地分隔。所以，他“漫不经意”地答应了与琳达订婚。他以“一种腐败的勇气”漠视着姐姐琳达愈来愈强烈的愤怒，以一个深爱他的女人的无辜受罪为代价滑向了道德泥沼的更深处。他似乎是“将银子的脉络焊进了自己的生命”，努力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某种伦理道德上的依据：富人靠从穷人那儿掠夺财富生活，而他偷取银子“只不过拿了富人由于愚蠢和背信弃义差一点丢失的东西”。妹妹吉赛尔曾经恳求他忘掉银子和奢华，“为那些东西牺牲爱情不值得”。这爱的蜜语甜言也曾带给他“一种稀有的自由感”，但手带“银镣铐”的诺斯托罗莫已无法恢复自由，他失去了比银锭更为宝贵的财富：忠诚的爱与完整的灵魂[2](pp.401~417)。银子是一种永不腐蚀的金属，曾经拥有“绝对无畏与拒腐蚀”盛名的诺斯托罗莫也终于成了银子忠实的终身奴隶，他的堕落应归结于他贪得无厌的虚荣心，因为“虚荣心乃是最精致的一种利己主义，可以呈现出一切美德的表象”[2](p.229)。诺斯托罗莫活着的时候是银锭的主人和奴才，死后则变成了黑暗海湾上的一座守护神，彷徨在秘密财宝的周围。这一切似乎在提醒着人们：“一种违规行为，一个罪行，一旦进入人的存在，便会像毒瘤一样，将它蚕食殆尽，或像热痛一般，将它消耗枯竭。”[2](p.398)

银矿主高爾德是体现康拉德道德理想主义和物质利益关系的另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个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同时也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理想主义者”[2](p.163)。在他看来，银矿是他大展鸿图的“惟一空间”，他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找到“统领命运的感觉”。银矿也许“曾是一场荒诞的道德灾难的起因”，但他认为自己的行动必将“导致严肃的道义方面的成功”。所以，高爾德把理想和信念寄托在物质利益上，期待银矿的开发会给萨拉科带来所谓欧洲式的“法治、坚定的信仰、秩序与安全感”。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高德以一种“冷峻和无所畏惧的鄙夷”利用着现实社会中的腐败环境。他“不得不把钱财的事放在首位考虑,但他是将它作为手段提出来的,并非目的”[2](pp.50-56)。银矿的腾飞使高德手中的财富猛增,他似乎主宰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但他理想中的社会繁荣却始终受制于频繁更迭的政权和愚昧的贪婪。

高德和妻子也曾有过快乐的时光。在那时,“爱情可以进入任何主题”,他们“可以热烈地活在遥远的词句里”[2](p.46)。而他一旦“将单纯的感情、欲望或成就统统加以理想化”[2](p163),那曾经汹涌的激情就只能蜕变成彬彬有礼中的距离感和冷漠感。他顽强坚定地效忠于物质利益,坚信从中将获得秩序与公理的胜利,他“对伟大银矿的献身是无可救药的”。他以物质利益作为实现道德理想的手段,却逐渐蜕变成了物质利益本身狂热的追求者。道德理想主义对高德来说只是一个幻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银矿以它非比寻常的魔力把高德父子两代人拖入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道德幻想。银矿杀死了父亲,却诱使儿子“陷得比料想的更深”。高德悲凉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价值已与物质利益结为一体,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因为“物质利益绝不会容忍仅为了一个怜悯与正义的念头而危及自己的发展”[2](pp.387),“物质化的理想追求必然只能导致理想化的物质追求”[2](序 p10)。

如果说,诺斯托罗莫和高德都是那个“无信仰时代的牺牲品”[2](p.149),都是“陷入道德沦丧的大网却奇怪地显得无能为力的人”[2](p.308),那么,小说中的莫尼汉医生则恰好与之形成了一种对照。莫尼汉医生既无声名,也无荣耀,脸上总是带着“一种夸张的、充满悔恨的痛苦”表情。他知道自己够得上背叛这个词,因为在动乱时期他曾出卖过他最亲密的朋友。他无法原谅自己,所以即便是处于叛军首领索罗蒂的折磨之中,他仍然让自己的为人处世服从于一个较高的理想标准。他把他“天性中储备着的丰厚的忠诚”全部奉献给了高德夫人[2](p.286)。也许现实的环境剥夺了他表达和拥有这份爱的机会,但无私忠诚的爱却促成了他的灵魂与道德的新生,给了他行动的力量和赢回自尊的可能。同样是对于自己道德污点的忏悔,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灵魂沉沦后的觉醒,而诺斯托罗莫临死前的告白留给我们的只是一片道德天空的黑暗。诺斯托罗莫不是为自己所爱的人而死,他死于自己所憎恨的银子和对物质利益的执迷。除了好名声以及被他背叛的理想,他什么也没有留下。而莫尼汉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什么好名声,但他却配得上更好的名声。早年的背叛被赎罪,外表丑陋的医生背负灵魂的十字架谦恭前行,终获得救,而外表英俊的诺斯托罗莫却身负道德堕落的羞辱,永远地走向了沉沦。

《诺斯托罗莫》写于1904年,正值爱德华时代的开端。经过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化演进和财富的积累,英国社会在这时已呈现出一派安静平和与欣欣向荣之景。但就在这表面的繁荣和乐观主义底下,却蕴藏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和深刻的思想文化危机。工业化的确让人们看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物质富足,但同时也对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就源远流长的神圣理性和人道主义原则产生了威胁。发动机一开动,人们就必须工作,这是个功利主义的时代。成功意味着富有,而失败则意味着孤立与贫穷。人人都在理智而又疯狂地追逐物质利益。人性的纯朴善良、心灵的和谐完整不得不屈从于利欲的冲动,人们再也无法从古老的宗教中寻找精神和灵魂上的慰藉,在享受物质繁荣的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承受文化心态上的失衡和失去信仰后的孤独。有上帝的时候,为上帝而工作的信念造就了人在现实世界的种种追求,而上帝一旦远离人们而去,“一种单纯的工作欲就会转换为赢利欲,人的诚实和公正就会被不惜一切的赢利目的所取代”[5](p.16)。

康拉德敏锐地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此时弥漫于英国人内心深处的那种危机感和茫然感。《诺斯托罗莫》可以说是一个执著的思想者在此迷惘困惑时代中痛定思痛的醒悟,它不仅凝聚着作者对危机世界的忧虑与反思,也折射着他人类命运和道德理性的不懈探求。康拉德被利维斯评判为英国文学史上少数难得的天才之一,这种天才的标志就在于他有着“对精神世界风云变幻的敏感性”[4](p.268)。在康拉德看来,小说是一种“专注的努力”,目的在于发现“人类经验中具有

恒久和本质价值的东西”[6](p.1),因此,不像科学和哲学那样具备直接的、实用的价值。他特别注重小说的道德功能,认为小说不仅是“根治苦难人类的种种疾病的惟一良药”[7](p.19),同时小说创作中某种“道德上的发现也应该是每一个故事的目标”[8](p.62)。

康拉德“对英国商船社所代表的那种人类成就——传统、规训和道德理想——抱有极强的信念”[4](p.333)。“我并不是生来就承继了那种传统,但它却在我年轻时塑造了我性格中的基本部分”[9](p.223)。他认为:“这个世界建立在几个十分简单、像岩石一样古老的观念之上,其中之一就是忠诚。”[10](p.212)“默默无闻地面对着危险,绝对忠实于传统”[9](p.222),这不仅是康拉德为身染道德沉疴的现代人开出的一副良药,也是他认定的人之为人的基本条件。早年阴暗痛苦的人生经历不仅形成了他忧郁敏感的个性气质,也铸就了他对人生与人性内涵的深刻认识。“一个人最不能相信的就是他自己”[2](p.237),人的一生应该以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生活在一种“希冀的纷扰”状态中,既要对前途充满乐观,又要时时警惕人性中潜藏着的恶。他关注现代人的生存现状,认清了在这个危机四伏、同时又充满着背叛与欺诈的世界上,宗教的说教已经无能为力,人只有依靠“一种直接的责任感、一种无形的约束”来自我拯救自己[9](p.216)。康拉德试图借助艺术的力量“让忙于尘世劳动的手暂时停下来,让迷恋于长远目标的人们看一看周围世界的形状和颜色,看一看光明与黑暗”。他还要“借助文字的力量”,使读者“听到、触摸到,最重要的是看到”“生活中的全部真理”[6](p.xlii)。

一个水手一生之中最希望的事就是“确定他的位置”,而康拉德则以《诺斯托罗莫》确立了他在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中的大家地位。这部小说无疑具有“一种特定的和代表性的道德意义”[4](p.319),但同时也显现出康拉德创作心理上的一种矛盾性。“忠于信仰是神话,信念的改变如同海上的迷雾”[11](p.51),“我所拥有的只是对一项彻底失败了的事业的忠诚,对一个没有前途的信念的忠诚。”[12](p.54)在《诺斯托罗莫》中,康拉德展现了人们“由于时代的痛苦而暴露的内心隐秘”[2](p.4),探讨了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人的命运、人的观念意识以及人性的完整等诸种道德伦理问题,反映了人在现代社会中从高贵的天使被异化为物质利益的囚徒后的可悲境遇。但康拉德精神气质中的悲观意识和当时盛行的怀疑主义思想的影响,又使得他的这种“再现”多少带上了一层悲观失望和虚无主义的底色。他通过诺斯托罗莫的堕落,执著于对道德意义的叩问,同时又通过记者德考得的怀疑论确认了人生的虚幻;他鄙视高德的“英国人品”(Englishness)中所显露的虚伪理性,却又憎恶高德执迷于银矿时对爱情所表现出的冷漠的非理性;他肯定莫尼汉医生忠诚献身的品格,却又以其“短促、无望的干笑表达了对人类的一种怀疑”[2](p.34);康拉德看到了现代人的孤独,主张建立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一种“共同命运的同情意识”[9](p.220),却又把这看成是没有前途的事业;他一方面强调内化于人性中的道德原则如何执行自我审判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强调在面对现实时人性的软弱性和不可知性。小说中的柯斯塔瓜纳共和国就像是他另一部小说中的海船“水仙号”:“它有它自己的航程;那践踏在它甲板上的人们赋予了她生命;同将她抛弃给大海的陆地一样,她也有忍受不了的悔憾与希望的重负,被胆怯的真理和狂勇的谎言所盘踞。”[13](p.195)

对康拉德而言,道德的标尺不仅在于衡量人性的善恶,还可以评判国家政治与社会文化发展的良莠。他认为,在柯斯塔瓜纳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如果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存在着精神和道德上的黑暗,在其上层存在着政治上的短视和不成熟,一旦社会的道德信念屈从于物质利益的膨胀,其结果就只能导致贪婪的剥削和频繁的革命。康拉德出生在波兰,但他在英国“从未感觉自己是陌生人,从思想到制度丝毫没有不适应的感觉”[13](p.5)。他保持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而英国文化影响他的则不仅是一种绅士风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一种文化判断上的反思能力。他对英国文化特有的重商主义传统极为反感。在他眼里,伦敦城稳定和华丽的外表之下,生活一片黑暗。他理想中的社会是一个人人心灵完整、关系和谐、井然有序的理性和道德社会。他认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决不应

该“依赖道德败坏和精神黑暗的奴隶制,依赖人数众多的野蛮力量”,而应该“受到集体良心强有力约束”,依赖“信仰和勇气”以及“合乎逻辑的发展”[9](p.108)。

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曾提醒读者别忘了在康拉德的小说中“孤寂的主题是何等的频仍和重要”[4](p.335)。的确,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孤独感是两个紧密相连的主题。诺斯托罗莫在意大利语中意即“我们的人”。但“我们”到底指的是谁?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诺斯托罗莫从头到尾都被人利用,显然不属于中上层社会的利益集团;他也不属于下层的水手和码头工人,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在这群人中具有某种不同一般的地位,拥有某种施加影响的权力。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讽刺。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可以说是这类“我们的人”。高德除了自己的银矿,什么都不想。他很少回家,常常“孤身一人在世界的金库中”。而作为“慈爱化身”的高德夫人则“仿佛陷入了贵金属的重重包围之中”[2](p.169),经受着一股股扑面而来的孤独浪潮的袭击,她已“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拥有他,哪怕是短短的一小时”。没有人会关切地询问她在想些什么,她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以率性的真诚与之推心置腹”[2](p.397)。对他们夫妇而言,物质利益的成功也许是巨大而持久的,但甜美的爱情犹如南柯一梦,留给彼此的只是深深的伤痛和无以排遣的孤独。在小说中,孤独也是通过黑暗的意象来加以表达的。这种黑暗总是带给我们一种阴郁和神秘的氛围:街道是黑暗的,马车驶过路面,照亮的是两旁一张张担惊受怕的面庞;海湾是黑暗的,诺斯托罗莫和德考得近在咫尺却看不清对方;小岛是黑暗的,在黑暗中维奥拉开枪击中了诺斯托罗莫。海湾上空微弱的星光象征着理想的渺茫,它穿不透笼罩在萨拉科上空的重重迷雾,也驱不散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孤独与茫然。康拉德曾说过:“我们的生活和在梦中一样,都是孤独的”[11](p.46),“生活不了解我们,我们不了解生活,我们甚至不了解自己的思想”[11](p.84)。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康拉德“总是力图超越对价值的一般推论,总是把意象上升为象征”[14](p.21)。象征对他而言,已不再仅仅是一种表现手法,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学理念,一种富于哲理意味的康拉德式的把握世界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道德发现以及人格自我完善的艰难,同时也使作品在具有一种“复杂性、感染性、深度和美感”的同时,也拥有了一种“表面美之下的道德品格”[15](p.245)。

有论者指出,康拉德比起哈代“更具有世界意义”,他的小说“有一个更大更系统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的视野”[11](p.50)。《诺斯托罗莫》的故事情节也许“每一桩都与史实有密切的关联”[2](p.4),但它决不仅仅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它无疑还具有另一种哲学和伦理学上的永恒意义和普遍意义。一心向往理性和稳定的康拉德和其他英国人一样,无法挥去世纪之交弥漫于心头的那种焦虑不安和疑惑彷徨,他把这种情绪巧妙地融入了他的小说人物,写成了这部极富现代道德寓意的《诺斯托罗莫》。他使我们看清了“物质利益带来物质变化,更有其他微妙的、不易察觉的变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思想和心灵”[2](p.383)。更可贵的是,他向那些在困厄中挣扎以求精神重生之路的灵魂探索者提出了以下忠告:“但凡执著于固定念头的人往往会走火入魔。”[2](p.289)

#### [参 考 文 献]

- [1] Eloise knapp Hay. Nostromo[A]. J. H. Stap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seph Conrad[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81-99.
- [2] 康拉德. 诺斯托罗莫[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3] Juliet McLauchlan. Conrad: Nostromo[M].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 1969.
- [4] F. R. 利维斯. 伟大的传统[M]. 北京:三联书店,2002.
- [5] 吴浩. 自由与传统:二十世纪英国文化[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

- [ 6 ] Joseph Conrad.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 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7 ] Ford Madox Ford. *Thus to Revist: Some Reminiscences* [ M ]. New York: Octagon Books, INC, 1966.
- [ 8 ] Joseph Conrad. *Under Western Eyes* [ M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Ltd, 1980.
- [ 9 ] 康拉德. 文学与人生札记 [ M ].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2000.
- [ 10 ] 康拉德. 大海如镜 [ M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 [ 11 ] Cedric Watts. A Preface to Conrad [ M ].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2.
- [ 12 ] Jefery Meyers. Joseph Conrad: A Biography [ M ].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
- [ 13 ] 康拉德. 康拉德小说选 [ M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 14 ] Robert Penn Warren. *The Great Mirage: Conrad and Nostromo* [ A ]. Harold Bloom. *Modern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Joseph Conrad's Nostromo*, C].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86. 7~22.
- [ 15 ] Robert Kimbrough. Joseph Conrad: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 M ].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1979.

〔责任编辑·徐 枫〕

## Conrad's Nostromo: Degeneration of the Soul and the "Discovery of Morality"

HU Qiang, YIN Qi-pin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Recent researches in China tend to focus on Joseph Conrad's sea novels and jungle novels, and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is political novels. *Nostromo*, based on Conrad's personal experience, is widely recognized by western critics as his most ambitious undertaking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novels in the 20th century.

*Nostromo* is now more often praised for its realistic and complex characterization and honest explor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fortunes of varied protagonists are told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n undeveloped South American country Costaguana. Conrad has focused on the dramatic action of the revolution there to explore such challenging themes as the idea of historical determinism, arrogance of imperialism, skepticism and individual heroism, individual isolat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aims and action. The dominating theme, however,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moral idealism and material interests, which is rarely presented through abstract statement but vividly demonstrated by the action embodying the ideals, motivations, and failures of characters.

Since the novel is much concerned with corruption through obsession by material interests, characters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ose who are excessively concerned with material interests and those who are not. Individuals in both groups labor under one form or another of delusions. The "incorruptible" *Nostromo*, lured by the prospect of enrichment, turns traitor. Gould lavishes affection on the silver mine rather than on his wife. Decould, overpowered by a sense of solitude and skepticism, commits suicide. Minor or major, all the characters willingly or unwillingly become involved with material interests and most of them are victimized, corrupted, disappointed, or frustrated. By anatomizing such a relation, Conrad unfolds his profound disbelief in the perfectibi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his worries about other social and ethical problems.

The novel's personal themes are closely interwoven into its public themes. *Nostromo* is a great, massive symbol of Conrad's total vision of mankind and world. Within the artistic whole of the novel Conrad presents the circumstances and attitudes which he believes work to prevent society or government from working morally. For Costaguana or any other countries, if there is mental darkness at the bottom and political indolence or

immaturity on the top, and if faith is put in the advancement of material interests, the result must be exploitation and recurring revolution. Costaguana is not merely a typical country in South America. Its turbulent history could be that of any other countries which go through a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The theme of "material interests" represents Conrad's view of a perverted political doctrine, and of the havoc wrought by industrialization. The novel abounds in paradoxical situations and devastating ironies and the story does not lack "actuality", yet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insist too much on this. The principal action of the novel takes place within only three days, but its span of time and space has epic breadth. By a wonderful fusion of the internally private and the externally public, by a superb embodiment of ideas in images, and by relating events in a chronologically disarranged order, Conrad makes his Nostromo attain a kind of timelessness and universality.

**Key words:** Conrad; Nostromo; psyche; morality

## 社会关系影响青少年自我的发展

青春期是个体自我探索的时期，也是个体自我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自我心理学研究领域，普遍地认为社会关系对青少年自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少年的社会关系包括与成人（主要是父母）和同伴的关系，两类关系都影响着青少年的自我发展。

大量研究表明，青春早期与父母的良好关系有助于青少年个体自我的积极发展，如美国发展心理学家 Hauser 等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倾注的感情、抚养孩子的能力，以及对孩子的接纳程度，是与青少年自我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Hauser 特别指出父母的接纳和移情作用与青少年的语言能力的进步密切相关，受到父母贬低的青少年的语言能力则有衰退的倾向。另外，也有研究发现，整个家庭的关系质量同样影响青少年个体的自我发展，如美国心理学家 Graber 等发现，那些在缺少亲近及有更多冲突的家庭中成长的青少年，成熟得更早也更快。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的重要社会关系，同伴关系对青春期少年的影响更为显著。美国心理学家 Larson 和 Richards 认为，这是由于进入青春期，青少年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明显减少，而是更多地与朋友相处。美国心理学家 ester 也认为，当个体进入青春期，同伴友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同伴之间变得更亲密，更具支持性，朋友之间更畅所欲言。美国心理学家 Dubois 等的进一步研究表明，进入青春期后，伴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更多地受到同伴关系的影响。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青少年的自我发展，专门从事青少年研究的美国心理学家 Wentzel 发现，良好的同伴关系会有利于个体获得学业成就和产生亲社会的行为，并且受同作欢迎的青少年拥有亲近朋友，对人友好，具有幽默感和智慧。当然，同伴影响也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如青少年行为问题的产生。美国心理学家 Urberg 等研究发现，同伴会影响个体产生种种行为问题，如抽烟、喝酒、行为不良等，Dubois 等对自尊和社会支持所作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同伴的影响比父母的影响更易导致青少年个体的行为问题。不良的同伴关系更深层次地影响着青少年自我的发展，如受同伴欺骗，会极大地影响青少年自我的发展。美国学者 Egan 和 Perry 以及 Graham 和 Juvonen 的研究都表明，同伴欺骗会导致个体自我概念发展的障碍。所以，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同伴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对个体自我发展的影响作用更大。

社会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一般认为，青少年与父母的关系会影响个体与同伴的交往，因为青少年将早期在家中的人际经验带入了与同伴的交往中，Brown 等研究人员证实了这一点。而美国心理学家 Lieberman 等研究也表明，来自关系和睦、支持性家庭的青少年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并报告拥有更具积极意义的同伴友谊。两类社会关系在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均会影响青少年的自我发展，虽然与父母的关系在青春早期就产生作用，但是同伴关系影响个体的作用时间更长、影响更大，两者相互联系、共同作用，成为影响青少年自我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社会因素。

(周宏敏)